

我对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回忆

项德言

一九二九年春，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工程已基本竣工。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，成立总理奉安委员会，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，为举行总理奉安大典日期，即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纪念日。因一九二八年冬雨雪多，迎榱大道未能如期竣工，中常会决定把奉安典礼展期至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举行。五月十八日，宋庆龄偕同孙科、戴恩赛夫妇赴北京碧云寺，瞻仰孙中山灵柩，二十二日将孙中山遗体重殓，准备南移。

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选派林森、吴铁城、郑洪年等为迎榱大员，各部处派秘书一人及职员若干人随行。中宣部为张廷休，中组部为张道藩，中训部为史维焕，中秘书处为王子壮。一行先赴北京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恭迎灵榱南下。

当时，我在中宣部指导科任代理总干事，主要工作是负责审查报刊的出版工作，对一星期中的宣传纲要进行指导。中宣部每星期都要制定宣传要点，都由我赴电台，将中宣部宣传要点向电台作扼要说明，并由我向全国口播本星期宣传要点的新闻稿。中央广播电台就设在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内。林森、吴铁城、郑洪年三人赴北京之日至六月一日这段时间里，仍由我去电台播发了一星期的新闻宣传要点四、五条，主要内容即为中常会关于奉安的决定、回宁时间及奉安内容等。

中宣部具体负责奉安的是部长刘庐隐(曾任考试院长),属下设三位秘书,分别为肖同兹、张廷休、朱云光。五月二十二日之后,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傖到中宣部召集各科负责人会议,布置有关奉安大典的具体工作,部里科主任(当时科不设科长)以上人员均出席了会议。中宣部的指导科主任为傅启学,编纂科主任为钟天心,出版科主任为崔唯吾,征审科主任为肖同兹,国际科主任为郎醒石,总务科主任为沈君甸,我以指导科总干事名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会上,根据各科原来的工作范围派定了任务。指导科负责奉安大典的具体宣传工作,编纂科编写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及哀思录等,出版科负责有关奉安典礼的文字印刷发行,征审科对外征集孙中山先生的史料,国际科负责对外宣传奉安大典实况,总务科负责接待事宜。

五月二十八日,总理灵柩到达浦口,中宣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均前往码头迎灵,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悉数云集此处。约下午五时,灵柩由“威胜”军舰载运过江,停泊在中山码头,宋老夫人偕宋蔼龄在此迎候,再迎至城内丁家桥中央党部,停放在大礼堂讲坛上。

次日至三十一日,奉安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党部大礼堂对外开放三天,进行公祭,市民可以自由出入瞻仰中山先生遗容。公祭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主持。二十九日,为中央委员、国民政府委员、党政军警代表公祭,中宣部全体职员也于是日参加。三十日,为群众代表公祭;三十一日,为各国使节、外宾公祭及家属祭奠。具体引导、招待、迎送由中秘书处派专人负责。公祭期间,各界人士争先恐后,络绎不绝,急欲一睹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周年后的遗容,大家饱含沉痛,依依不忍离去。直到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多,举行封棺典礼,瞻仰人群方告别散去。

六月一日凌晨,举行起灵典礼,狮子山炮台鸣放礼炮一百零一

响致敬，参加恭送人员在送灵队伍总指挥孔祥熙的带领下，全体肃立致哀。从中央党部至中山陵，二十多里的公路两旁，夹道迎灵柩经过的群众，男女老少，万头攒动，无不自觉地肃立默哀致敬。灵柩由中央党部出发，经丁家桥、狮子桥前外交部门前经过，转鼓楼直向中山大道、新街口，再转中山东路，出中山门，到陵园路。灵柩由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人谭延闿、蒋中正、胡汉民、戴季陶、于右任、王宠惠、林森、蔡元培、张继、宋子文、丁惟汾、叶楚傖、何应钦、朱培德、李烈钧、邵元冲、陈果夫、陈立夫、朱家骅、罗家伦、孙科等执绋前导，缓缓徐行；女眷则有宋庆龄、宋老夫人、宋蔼龄、宋美龄、孙科夫人、戴恩赛夫人及其子女，在行至鼓楼后始分乘几辆马车随后驰行；后面是各机关、团体的男女职员身穿素服，依次步行。送灵队伍一边行进，一边同声高唱奉安歌（歌词为罗家伦所作）：“大道兮填填，哀吹兮极天，肃奉安兮国父，灵輶兮计迁……”歌声此起彼落，悲壮感人，伴着乐队奏的哀乐，悲戚气氛萦回在整个南京城、紫金山上空。送灵队伍总指挥孔祥熙，骑着高头白马，驰骋在队伍行列之间，指挥队形，维持秩序，肃穆前进。约十时后，灵柩抵达紫金山麓停下。由执绋人员轮换着、一步步地抬级而上，昇上中山陵堂。十二时正，移入陵寝，狮子山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。这时，举国上下，全体人员，就地肃立默哀三分钟，表示深切沉痛哀悼。

陵下，有一碑竖立，上有谭延闿书“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”几个大字。

奉安大典结束后，奉安委员会向参加奉安人员各颁发了一枚奉安纪念章和一本哀思录，作为永恒纪念。

奉安纪念章呈圆形，黄铜铸造，直径七十六毫米，厚四毫米。正面是孙中山先生浮雕正面头像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威严庄重。背

面是中山陵祭堂缩影，祭堂是花岗石建造，正面三拱门，装置了紫铜双扉，门额顶端分别用篆文书写三民主义的“民族”“民权”“民生”等字样。中门顶端镌有孙中山先生手书的“天地正气”直额一方，堂前石阶辟为三道，整个祭堂庄严肃穆，图案清晰可辨。图案上方周边镌有“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”和“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”字样。奉安日期实际系六月一日，纪念章上却为三月十二日，系因纪念章事先委交美商制造，以致日期上出现这个失误。每枚纪念章用一个蓝绶镶制的硬盒子盛装，十分精致美观。

哀思录由总理奉安委员会和中宣部合编，系蓝底封面，优质白纸铅印，呈狭长型，二十四开本。内容刊登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，全国各界赠送的挽联、祭文和治丧委员会、总理奉安委员会成立经过，以及各委员会的委员和职员的名录。凡参加奉安人员都载入职员录。封面哀思录三个字，由中宣部长刘庐隐题签。

以上这两件珍贵纪念品，由于我是亲身参加者，有幸也各获得一份，一直珍藏在南京马家街我家书房里。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，接着又发生了“八一三”事件，南京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威胁，妇女老少多疏散到安全地带暂避，我则因为参加中央前线视察团工作，要经常奔赴各前线巡视，无暇顾及家中事物。不料当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即告沦陷。随着战火的蔓延，这些珍贵纪念品连同我家一切财产（只剩下一个房子空壳），都毁于兵燹。

南京中山陵从孙总理奉安以后，经历了南京沦陷、日寇长期占领、汪精卫统治等几个阶段，始终安然无恙。这倒不是有什么神灵佑护，而是由于孙中山先生“首创革命，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”的丰功伟绩，及其“世界大同，天下为公”的伟大思想，深为世人所景仰和崇敬，正如日月江河、经天纬地一样，谁也无法逾越阻挡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